

日治時期啟蒙運動的再現： 《滄溟行》、《荒村》的歷史敘事

林淑慧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台灣文化及語言文學研究所副教授

siokhui@ntnu.edu.tw

摘 要

台灣大河小說常結合真實與虛構的歷史敘事，呈現關於人類命運與理想的思考。如鍾肇政《台灣人三部曲》、李喬《寒夜三部曲》中的第二部《滄溟行》及《荒村》，運用「台灣文化協會」、「台灣農民組合」等相關史料，再現家族參與當時啟蒙運動的情境。哲學家康德以為啟蒙的特徵是脫離「不成熟」狀態的過程，亦即修正意志、權威及理性運用之間的原有關係，並蘊含尊重人權自由的世界觀。究竟作家是如何有意識地消化龐雜的史料，再現這段台灣文化史上的重要事件？又是以何種虛實交錯的寫作手法，想像或建構歷史的脈絡？本文就台灣文化協會與農民運動史料的轉化、演講的氛圍與啟蒙意義，以及主題人物的真實與想像等層面爬梳文本。同時參酌相關一手檔案、文獻，分析小說中的情節編織技巧，詮釋其歷史敘事的特殊質性，並探析作家如何藉由小說人物的言論及行動，想像日治時期台灣群眾的啟蒙思維。

關鍵詞：大河小說、台灣文化協會、台灣農民組合、敘事、再現

一、前言

台灣三部曲形式的長篇歷史素材小說，翻轉從殖民者的位置所觀看的台灣史，並呈現對於人類命運與理想的思考，因而具有跨領域學術研究的意義。台灣曾舉辦大河小說相關研討會，如：2006 年國家台灣文學館籌備處曾舉辦「台灣大河小說家作品學術研討會」，有關個別作家的研討會則有：「鍾肇政文學國際學術會議」（2003）、「李喬的文學與文化論述研討會」（2007）及「《台灣大風雲》學術研討會」（2007）等，亦論及長篇歷史素材小說的成就。至於目前有關大河小說的學位論文，以及日治時期社會運動團體的研究面向，多著重於探討土地意識、殖民地經驗、族群認同等主題。此外，在小說中所提及的社團組織，如台灣文化協會、台灣農民組合的研究，歷史學界的研究面向多集中於組織的結成、運作與瓦解的歷程等。這些人文學範疇的論文已積累一些研究成果，但有關此類三部曲形式的歷史素材小說，因結合真實與虛構的敘事，且運用史料與文學想像的手法，所牽涉的範疇廣泛，許多議題值得再深入分析。若就小說中相關的史實與想像等面向而言，這些小說蘊含了哪些與台灣文化史密切相關的核心事件？究竟作家是如何有意識地消化龐雜的史料，再現台灣文化史上的重要事件？

當日治初期各地武裝抵抗活動慘遭鎮壓，造成民眾大量傷亡之後，許多知識份子曾思考該如何因應殖民處境。「台灣文化協會」的成立，即是受到歐戰後民族自決及民主思潮的影響，進行非武裝抗爭的文化啟蒙活動。在農民運動團體方面，則有各地陸續籌組農民組合，及 1926 年 6 月成立全島性的「台灣農民組合」，以實際行動參與爭取農民權益。¹然而，在日人所主編的報紙、文獻或檔案中，卻常貶抑這些團體的抗日活動及形象，顯露殖民者書寫的視角。鍾肇政《台灣人三部曲》、李喬《寒夜三部曲》中的第二部《滄溟行》及《荒村》，多運用「台灣文化協會」、「台灣農民組合」等日治時期相關史料，並結合田野訪談經驗，再現小說中人物參與當時啟蒙運動的情境。Benedict Anderson 提出「印刷資本主義」的概念，主張小說在 18 世紀以後創造出同一時間內設想同一世界讀者，因而促成了民族主義或國家的認同過程（Anderson, 1991: 1-7）。本土作家藉由大河小說以逆寫帝國霸權，具有重構歷史與身份定位的功能，有助於凝聚台灣意識的形成，及對土地的認同。長篇歷史素材小說，以故事情節鋪陳家國命運的大敘事與民眾的小敘事，亦是文化再現的有效形式。就敘事學來說，著重於敘事文本（narrative text）或敘事虛構作品中所出現的敘述過程（譚君強，2008：19）。在文學敘事表現的意義上，「再現」往往和意象與模式有關，意義是一種模擬的再現，透過故事敘述或意象，以文字來表現世界所發生的事。《滄溟行》及《荒村》是以何種虛實交錯的寫作手

¹ 日治時期的台灣文化協會與台灣農民組合等團體的學位論文，如林柏維(1985)〈台灣的民族抗日運動團體——台灣文化協會之研究（1921-1927）〉、陳翠蓮（1986）〈日據時期台灣文化協會之研究——抗日陣營的結成與瓦解〉，以及楊光華(1998)〈日據時期台灣農民組合之研究〉、潘俊英(2004)〈台灣農民運動初探(1895-2005)〉等。

法，想像或建構歷史的脈絡？「演講」為當時重要的文化活動之一，小說呈現演講的哪些氛圍與啟蒙意義？作者又是如何表現這些主題人物的真實與想像等層面？本文擬以此三部曲形式中的第二部小說為文本，參考日治時期法院資料庫²、知識份子的日記、作家的訪談、自述或回憶等，探討小說所載日治下的知識份子如何藉由文化啟蒙運動喚醒民族自覺，再現群眾的抵抗精神，以呈顯文化主體性追求的受阻情境及實踐的面向。

二、台灣文化協會與農民運動史料的轉化

敘事是以具有開頭、中間、結尾的次序，來安排事件的一種論述形式；情節是敘事最重要的特徵，是使事件陳述具有敘事性的重要關鍵。賦予情節的過程中，敘事並非反映事實而已，而是包含選擇、重組、簡化現實等機制（Hinchman, Lewis P. & Hinchman, Sandra K., 1997: 15-16）。也就是說，敘事帶有一種將史料轉化的功能，經過敘事者的巧妙運用，歷史的敘事得以從另一種角度呈現，歷史的書寫權力也將從絕對威權中釋放。李喬認為「歷史素材小說」是以歷史為素材（material）的純小說寫作，是作者借重歷史素材的可能性，藉由變化以存其事實，偏重「歷史事件」中的個人解釋，顯示作者的歷史觀與生命觀；而「歷史小說」（historical novel）則是偏重在趣味性及歷史事件的浮現及對其理解（李喬，2006：219）。就此觀點看來，鍾肇政《台灣人三部曲》、李喬《寒夜三部曲》皆屬於歷史素材小說。三部曲中的第二部《滄溟行》、《荒村》的情節皆聚焦於日治時期。就史料的運用而言，李喬曾於〈荒村·後記〉³中提到：「《荒村》引用的史料比起《寒夜》、《孤燈》更是浩瀚繁複。」（李喬，2001：522）茲將《荒村》中註解所引文獻整理列於表一。

表一 《荒村》註解中所引用的文獻

書名	作者	頁數
《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志》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	頁 30、33、406
《臺灣社會運動史》	宮川次郎	頁 33、218
《臺灣省通誌稿》	台灣文獻會	頁 55、85
《羅福星抗日革命案全檔》	台灣文獻會	頁 116

² 「日治法院檔案」主要內容為台北、新竹、台中、嘉義等 4 個地方法院所典藏的日治時期各類司法文書，包括民刑事判決原本、民刑事案件登記簿、非訟事件以及強制執行事件等卷宗、公證書原本、有關係人等的各種登記簿、行政卷宗等，其中台中刑事判決原本保存於司訓所，此外尚有少量由台灣高等法院、高雄和花蓮地方法院所典藏的日治時期司法文書。檔案所涉時間始自 1895 年，迄於 1945 年，呈現日治 50 年台灣法院之運作實況。日治法院檔案資料庫網址：<http://tcra.lib.ntu.edu.tw/>。

³ 《荒村·後記》一文，收錄於李喬，2001，《荒村》，台北：遠景，頁 522。本論文所引頁碼皆以此版本為主。

《日據時代臺灣糖價之研究》	曾汪洋	頁 218
《日據時代臺灣經濟之演變》	張漢裕	頁 218
《臺灣經濟年表》	吳幅員	頁 220
《臺灣糖業論》	平山勳	頁 220

（資料來源：李喬，2001，《荒村》，台北：遠景。）

李喬為了寫作《荒村》，閱覽眾多參考資料，另又於書中以當頁註的方式，詳列文獻的出處，或補充小說正文所未及說明的內容。一般純文學的小說作品，少有作者自註的情形，但是李喬卻於《荒村》註解夾雜許多資料出處。這種特殊的寫作手法，與鍾肇政《滄溟行》未加註的方式有所差異。從表一觀察到，李喬引用文獻作為小說敘事的素材，參考的文獻類別以政治和經濟為主。除了日人所編《總督府警察沿革誌》以及宮川次郎的著作之外，又參閱戰後文獻會所整理的方志，及學者研究糖業等產業政策及經濟發展的成果。如此書寫策略，具有加深歷史素材小說的學術意味及說服力。此外，他又企圖以田野調查的方式，體驗超越時空的感受。李喬曾先後訪問 7 個當年「體刑」經驗豐富的「遺老」。訪談過程中觀察這些七十多歲的老人，「看起來都是慈眉善目，煦煦如鄉親。但是當一提及『經驗』事，各個訕訕然顧左右而言他，一致表示『沒有經驗』、『不清楚』。他們目光閃爍，逡巡徘徊，再也不肯和訪問者四目相向」（李喬，2001：522-523）。李喬得不到任何資料，但在無形中也獲得了「史實」。他運用歷史檔案文獻及訪談經驗，將其轉化並想像家族史的人物時代處境，呈現他個人對這些史料的詮釋。

就歷史與小說的相關性而言，兩者之間有共通之處：歷史家的著作有小說的效果，也就是產生意義（sense making），有了意義才能使人理解；而小說家也同樣在產生意義，使人看到生活中的意義。《滄溟行》與《荒村》皆鋪陳日治中期啟蒙運動的情節，兩書都先具體羅列各地抗爭事件，藉由武裝活動所遭遇的困境，呈現抗日轉型背景及動機，以助於鋪陳日治中期民間組織活動的情節。1920 年成立的台灣文化協會受到歐戰後民族自決思潮的影響，士紳階層與知識份子領導群眾漸轉向文化抗日的階段。《荒村》具體分析台灣文化協會的啟蒙運動，如：刊行公報、設置讀報社、舉辦各種講習會、全島的文化演講、設置中央俱樂部及文化書局，文化演劇及電影欣賞等。此外，又舉例提到支持「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連絡提攜島外學生運動、指導青年運動及農民運動等（李喬，2001：30）。綜覽《滄溟行》、《荒村》這兩本歷史素材小說，所呈顯的不只是歷史真實的部份，更有作者對於歷史的詮釋角度與獨特論述。兩者內容描述的年代、主題相仿，文中的核心事件情節表現方式亦有類似之處。以下將《滄溟行》、《荒村》與文化啟蒙運動有關的情節歸類於表二。

表二 《滄溟行》、《荒村》文化啟蒙運動情節歸類

核心事件	《滄溟行》	《荒村》
武裝抗日的受挫	噍吧嘰（西來庵）、北埔、苗栗、	1915 年（大正 4 年）的「西來

	林杞埔、土庫、六甲等武力抗爭事件，遭殖民政府鎮壓，致使人民死傷無數（頁 31）。	庵事件」，台灣總督府判處 915 人死刑，坑殺暗殺無辜百姓 3000 至 5000 人。此後有志之士不得不轉而從文化、政治、社會、經濟等文化抵抗方式（頁 28）。
台灣文化協會的成立	世界新思潮影響下，知識份子紛紛參與六三法廢撤運動、台灣議會請願運動，以及農民抗爭運動（頁 40-44）。	1921 年成立的台灣文化協會受到歐戰後民族自決思潮的影響，士紳階層與知識份子以文化啟蒙的思維，領導群眾進行非武裝抗日的階段（頁 29-31）。
農民土地困境	日本政府的土地調查，使原本的私有地，皆變成「官有地」，並放領（拂下）給會社。在土地喪失與會社的壓迫之下，造成底層農民無經濟自主權，而成為佃農（頁 64-66）。	佃租、蔗農問題以及拓殖會社的成立，多造成農民困境；而「小作制度」以保護頭家為主，亦不利於佃農（頁 37、190-191）。
抗爭活動	反日本皇太子來訪（頁 67-73），第一次中壢事件（頁 303-309），赤牛埔事件、二林蔗農事件、竹林事件（頁 370-371）。	當警察執行假差押任務時，六十多位佃農手拿鐮刀鋤頭，無懼地出手阻止社方苦力工的收割，外圍更站了兩百多名的農民，之後更有七十多名農民攜帶伐刀、棍棒憤怒地到郡役所叫喊（頁 354-355）。
台灣農民組合的成立及影響	台灣中南部屢屢發生製糖會社的爭議糾紛，簡吉、黃石順等與會社抗爭。於是農民開始起而反抗資方的剝削並爭取自身的基本權利。此舉得到帝國議會與雜誌的關切，進而對執政者施加壓力（頁 114-118）。	大正 14 年 6 月 28 日，成立「二林蔗農組合」，選出李應章等 10 人為理事，一方面進行增進蔗農法益的請願工作，另方面聘請林獻堂等文協會員主要幹部演講，呼籲農民團結爭取權力（頁 223）。 台灣農民協同合作處理平定蔗農糾紛、佃農爭議、退休官吏奪取土地等，以及佃主的爭執、水源糾紛、產品價格、工資爭取等（頁 298）。

拘禁情境	牢房細而長，床位上鋪稻草，並充斥著異味，裡頭不准交談，故以指頭寫字與牢友溝通。分室中進行著各種體刑，如木棍毆擊、針刺指甲、灌尿灌尿等（頁 362-386）。	劉阿漢遭懸空吊起的體刑（頁 63-67）、在拘留室遭鞭打（頁 192-194）。 手腳以鐵鍊鎖緊在椅腳和把手上，一縷尖銳的劇痛像閃電般鑽進筋骨，以鐵錘敲打四肢凸起的硬骨部位，並注射毒液（頁 501-513）。
組織活動遭全面制止	農民與若干組織成員被捕，並判罪入獄，此後，赤牛埔、新店仔一帶的抗爭事件，已遭執政當局壓制（頁 351-371）。	拘押農民組合會員，控制出版言論（頁 481-482）。

（資料來源：李喬，2001，《荒村》，台北：遠景；鍾肇政，2005，《滄溟行》，台北：遠景。）

就敘事而言，表二反映小說家如何藉由情節的推進，陳述文化啟蒙運動的成因、過程及影響。李喬曾閱讀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發行的刊物，試圖理解早期台灣的土地狀況，得知原住民與漢人的衝突源自於土地觀的差異。土地是賴以維生的重要元素，甚至是唯一的生存之計，它帶來希望，但也帶來爭奪與痛苦（三木直夫等，2006：198）。所以他在《寒夜》第二部曲《荒村》中，針對日治時期土地政策的不合理，做為整部小說中的核心事件，以展開對造成農民衝擊的敘事。日治時期總督府透過國家權力，以放領官有地、強迫收買民有地等方式，扶植日本資本家、製糖會社，造成土地所有權高度集中、民有地遭掠奪等現象。當時農村地區仍存在高額佃租、收取保證金等不合理租佃關係，這些原因造成農民抗議事件。如 1923 至 1924 年林本源製糖會社蔗農爭議的背景，是因二林地區林本源製糖的甘蔗收購價過低，肥料價格過高，於是當地蔗農集體向台中州、總督府的殖產局提出請願書，結果二林蔗農獲得「臨時補給金」。此一事件刺激全台蔗農，紛紛向製糖會社要求提高蔗價（淺田喬二，1978：31-53）。《荒村》又提到，當時台灣文化協會幹部李應章、劉崧甫等人，以及黃石順、簡吉、趙港等多出面協助農民（李喬，2001：223-229）。1925 年（大正 14 年）6 月 28 日成立「二林蔗農組合」，共四百多名蔗農參加，選出李應章等 10 人為理事。二林蔗農組合成立後，一方面積極進行增進蔗農法的請願工作，一方面聘請林獻堂等文化協會主要幹部至二林作文化演講。他們批評製糖業與糖業政策的不當，呼籲蔗農團結起來爭取合理待遇，並提示爭議技術（李喬，2001：223）。⁴之後，各地零散的組合在此時紛紛成立，李喬在《荒村》具體以這些事件為背景，將農民的抗爭與組織成立經過的史實，編織於小說敘事結構中。

⁴ 鳳山農民組織改革時，其主要人物包括簡吉、黃石順、陳振賢、吳敦、謝賴登、張滄海等人。小作組合以公學校畢業後，就讀台灣總督府工業講習所的黃石順為中心，農民組合則以崇信共產主義的簡吉為中心（宮川次郎，1999 [1927]：101-102）。

二林事件發生後，日本勞働總同盟幹部麻生久、布施辰治來台辯護，各地農民組合的成員受到激勵。1926年6月28日大甲、鳳山、曾文等地的農民組合，共同成立了台灣農民組合，參與者包含簡吉、黃石順、趙港、楊順利等人（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1995 [1939]：1045）。鍾肇政亦將台灣農民組合成立的起因與過程，融入於《滄溟行》的故事情節。此書提到赤牛埔事件、二林事件、竹林事件等小規模的農村糾紛，使日本當局不得不開始注意，在帝國議會中也有人就此情形提出嚴厲的質詢，並欲派遣一個殖民地施政情形考察團來視察；而日本標榜民主的報刊雜誌，也漸出現指責並要求檢討的言論（鍾肇政，2005：372）。⁵台灣農民組合成立後，便在各地組織支部，1927年末全台已有27個支部，2萬多名組合員，發展相當迅速（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1995 [1939]：1070）。《荒村》則以農民運動中的兩次「中壢事件」，作為核心事件的詳述案例。1927年台灣農民組合中壢支部成立，在黃石順、謝武烈等幹部的帶領下團結農民，並舉辦演講會提高鬥爭士氣。在抵抗行動中，共有83人被起訴，此為第一次中壢事件。同年該地警察欲利誘、迫使台灣農民組合桃園、中壢兩支部解散；然而，中壢支部成員七百餘人平常以團結素稱，在簡吉、趙港等本部成員等策劃、鼓吹下，中壢支部又再次成立。警察隨即偵訊張道福等人，因農民擁進派出所抗議警察的行徑，在這次的行動共有35人被起訴，此為第二次中壢事件（葉榮鐘，2000：598-600）。《荒村》除了引用許多史料之外，也擇取小事件呈顯民眾受害的經驗，如：「在『第一次中壢事件』預審中，有一位四十二歲的婦人古葉氏錫。古葉錫抱著未滿周歲的小男嬰，迷惘又惶恐地不斷四面張望，好像要尋找訴說的對象或者什麼救星的出現。在判官正要問話時，小男嬰哭了，她羞赧地，但也無懼地打開胸扣，掏出乳房，給她心肝寶貝餵奶。這是農民運動中的第一大案件。這也是台灣人一道永難抹滅的創痕。」（李喬，2001：355）李喬藉由書寫民族創傷，表現抵抗的集體記憶；而母親哺乳的敘事，詮釋女性在逆境中所蘊含生命的能量。

《滄溟行》所呈現的內容，並非直接批判國民黨當局，或是純就日本殖民的反省，而是對戒嚴時期對執政當局諷刺的曲筆，也是對台灣人歷史的建立（錢鴻均，2003：73、113）。至於農民組合的情節於《荒村》中所佔篇幅多，是因那個年代台灣農民組合的領導者多為知識份子，他們是真正的實踐者。與無產階級的農民一起對抗日本、對抗地主，這是非常特別的案例。逆寫帝國的書寫策略包括以被殖民者的觀點顛覆來源文本，或是讓瘖啞者自己發聲，或是掩蓋甚而取代殖民者論述。其目的在於彌補文本中的縫隙（gaps）與沉默（silences）章節，因為帝國主義論述不曾將被殖民者文學與文化納入，被殖民者一直是匱缺與沉默的。《滄溟行》、《荒村》描繪民眾的處境，並為農民、婦人甚至嬰兒發聲。這些啟蒙運動史料的轉化，即成為台灣大河小說重建抵抗書寫的典律。

⁵ 本論文所引頁碼皆以此版本為主：鍾肇政，2005，《滄溟行》，《台灣人三部曲》（二），台北：遠景。台灣農民組合成立後，成員多積極參與農民爭議事件，從1926年到1929年之間其屬性可分兩大階段：前期受日本勞働農民黨指導，後期則為台灣共產黨領導（陳翠蓮，2007：95）。

三、演講的氛圍與啟蒙意義

瀏覽《滄溟行》與《荒村》中的歷史敘事，時可見作者書寫當時街頭演講的場景。為何鍾肇政與李喬兩位作者，多選擇以演講活動作為書寫的對象？日治時期台灣民眾在政治、經濟、教育各方面曾受到不平等對待，所以知識份子常感被壓抑的苦悶。他們參與台灣文化協會及「農民組合」等組織，並從事文化抵抗，指導農民為保護土地而奮鬥。台灣文化協會所舉辦的活動中，普及面最廣、參與的民眾最多，常能引起民眾共鳴響應，且又最具影響力的活動就是「文化演講」。他們考量當時台灣知識程度，讀報書社的文書宣傳效果有限，而通俗講習會則難吸引基層民眾注意，因此舉辦講演會是最容易收到成效的方法。文化協會成立之初，講演會只在台北、新竹、台中、台南、高雄等城市舉行。直到 1923 年會員黃呈聰、王敏川以台灣民報記者身份返台推銷《台灣民報》，順便作巡迴講演，內容提及民族主義以及對台灣統治者的批判時，引起了地方民眾熱烈的反應，文化協會才頻繁到各地舉辦講演會。《滄溟行》藉由鋪陳這些演講情境，以想像此類文化活動在農村產生的效應。書中曾載演講內容：「黃石順是流氓？是暴民嗎？他是一個安分的代書。去郡役所抗議的農民是暴民嗎？也不是，他們都是老實的耕田人。」（鍾肇政，2005：315-317）如此的反問修辭手法，加深了執法的荒謬及不義，也易啟蒙民眾的自主意識。

日本群眾史家柳田國男曾言，以民眾為主體的歷史，可探查群眾思想，並由此了解一個民族獨特的人生觀與世界觀；而透過研究群眾日常生活中食衣住行變遷的「感覺與意識」，方得以掌握每一時代的特殊風貌（邱琬雯，2001：99）。《荒村》以劉阿漢將至會場聆聽演講作為敘事開頭，藉此描繪農民受到文化演講的影響。生動描繪演講者敲打銅鑼，於「亭仔腳」、「榕樹下」，或苗栗城隍廟前、新竹城隍廟前的臨時市場，以及南門邊媽祖廟等親近民眾的空間，以達到聚集群眾的效果。《荒村》描寫擔任代書又熟悉法律的黃石順上街頭演講，一個木箱、一張木板，講台便形成；鑼聲一響、人潮漸聚，一場啟蒙演說就此展開。李喬運用修辭策略將環境、場景描寫變成烘托情節、人物的一種底色，以透露作者的思想傾向。

真實的材料不一定就值得入文，而有些虛構的題材，因為表達者的情感真誠無偽，或所欲彰顯的哲理貼近讀者的生命經驗，而打動人心（廖玉蕙，2000：95-116）。文化抗日情節的書寫，必須植基在實際的生活上，兼顧哲理與邏輯，才具備說服力與吸引力。在演講內容方面，《滄溟行》描寫黃石順如何發揮演講主題內容：「自從日本人來台以後，我們新店仔、新坡、石觀音一帶，還有赤牛埔、淮仔埔那些地方的幾千甲水田，全部成了會社的」。書中的黃石順從會社的剝削談起，一直說到農民因這種壓榨而一貧如洗、債臺高築的情形。至於虛構的人物劉明鼎演講時以小猴掙脫繩索而逃，以及「白歌

仔」在人類還未築完泥牆阻斷水流時，牠們就成群結隊溜走而保全性命等小故事，激勵群眾反抗意識。劉明鼎提醒自己要冷靜，「可是當主旨一進入『佃農』要創造自己的命運時，話頭、用詞，居然像烈火中烤焙的包黍棒，包黍米突然迸裂四散一樣，硬是控制不住。」（李喬，2001：318）又如《荒村》中劉明鼎演說的激昂情境：「我們要做一塊硬石頭，一個鐵球，這樣，人家才咬不動、吞不下去；我們如果是一個飯糰，一隻肉粽，那麼，我們只有一口被吞掉！」又說「權利是爭來的，合理的待遇是爭來的，沒有誰會白白給你這些。」（李喬，2001：335）呈現他即使遭總督府中止，甚而拘禁，卻表現無懼的態度（李喬，2001：344）。小說不僅藉由場景的描繪與氣氛的醞釀，強化演講的感染力；同時，也以演講的內容，加深啟蒙的效果。

《滄溟行》、《荒村》對於文化演講活動以及警察的執法手段，皆有傳神的描述。如《荒村》刻意紀錄演講遭中止的情形：「現在的警察機關，是暴行的大本營。八月間佐藤巡查像一個劊子手向他手下施虐——中止，被上了手銬。」又如「九月間警部補在審問室雞姦葉姓青年——中止，被上了手銬。」（李喬，2001：373）這些演講內容皆因批判警察執法而遭禁。若參照表三 1928 年（昭和 3 年）總督府檔案所列數據，則可見演講活動受總督府限制的情形：

表三 1928 年台灣文化協會講演會中止及解散情形

州別	台北	新竹	台中	台南	高雄	總計
回數	83	73	47	34	8	245
辯士	353	508	287	209	63	1420
聽眾	24850	42000	15940	11890	2380	97060
中止	132	179	90	94	22	517
解散	14	8	6	9	1	38

（資料來源：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1995 [1939]：219）

1928 年共舉辦 245 場演講，遭解散共 38 次，呈顯言論自由受到箝制的情形；中途遭停止的次數高達 517 次，顯示統治當局嚴加控管演講內容。該年聽眾總數將近 10 萬人，當演講遭解散或中止時，在場的聽眾常情緒激昂，對統治當局造成不小的壓力（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1995 [1939]：218-219）。日治時期的公開演講會分為兩種，一為普通的演講會，不用經過執政當局審核，舉辦單位可在任何時間、地點進行演講活動。二為政談演講會，內容為有關政事的演說，則需事前呈報當局，核准後才得以舉辦，且常有高級警官在旁監督（王詩琅，1988：384）。再以表四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的資料，呈現 1928 年（昭和 3 年）政談演講會的情形。

表四 1928 年政談演講會中止及解散情形

州別	台北	新竹	台中	台南	高雄	計	合計
回數	1 2△	1 4△	1 3△	1△	2△	3 12△	15
辯士	1 2△	7 4△	7 3△	1△	2△	15 12△	27
聽眾	350 600△	200 1300△	170 690△	150△	220△	720 2960△	3680
中止	1 2△	3 4△	4 3△	1△	2△	8 12△	20
解散	1 2△	4△	3△	1△	2△	1 12△	13

（資料來源：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1995 [1939]：219。表中印有△者為文化協會與農民組合聯合舉辦的土地政策反對大會。）

表四所列有關政談演講會的統計數據，顯示此類演講會中止次數與解散的比例相當高，以農民組合為主的場次更是全部遭解散。反對土地政策的演講，總督府常極力阻撓，執政當局干涉演講活動頻繁的次數，也於小說中表現殖民者顧忌演講影響民眾的程度。《荒村》中紀錄黃石順領導的農組幹部，計畫在桃園召開「反對大會」，當時的情形為：「演講會如儀開始，主席宣布開始同時，『臨檢』人員立刻宣布解散，所有預定演講人全部被上銬帶走，這時演講台上站滿了子彈上膛的武裝警察……這個晚上，黃石順、楊春松、黃又安、謝武烈等八名主要鬪士被捕，移送法辦。」（李喬，2001：354）具體紀錄當時從演講到遭解散及逮捕的景況。

若將論述活動或知識生產視為文化生產的一部份，殖民意識的培養、帝國心態的養成，以及帝國霸權的維繫，顯然還必須仰賴持續不斷的文化生產。若干符碼、意象、辭彙、信念以及這一切所構織的文化價值，皆屬於「態度與指涉的結構」（李有成，1997：13-15）。《滄溟行》形容當時報紙所描繪向日本政府抗議的人，都成為「暴民」、「不逞之徒」，報紙上書寫「一羣暴民湧進郡役所，新店仔發生一場騷動」（鍾肇政，2005：303-304）。殖民者掌控官方報紙的傳播勢力，企圖影響民眾的價值判斷；然而，小說卻發揮逆寫帝國的效果。書中的黃石順決定利用這報導，去做街頭演說，告訴當地人民真實的情況，如此不僅可以免去人們的誤會，還可以贏得大眾的同情。鍾肇政雖透過「因為身為弱者，沒勢力的一群人，無論怎麼向報館抗議都沒有用」的話語（鍾肇政，2005：303-306），表達處在殖民體制的無奈，但同時也藉以烘托演講在啟蒙運動的必要性。歷史上曾真實存在的人物黃石順，原任農組中央委員兼爭議部長，昭和2年9月改兼調查部長，並奉派駐在新竹州。書中詳細描繪黃石順向行政主任佐倉請求准許至街頭進行演說。他表示根據大日本帝國憲法，人民有言論的自由（鍾肇政，2005：307）。啟蒙

意謂個人有勇氣去運用自己的理性，打倒別人所賦予的概念與偏見。啟蒙是一種歷史與實際的侷限考驗，從本身的限制中理解那一層限制，並進一步完成自我解放的工作，使自己成為自由的人（Kant, 1963: 3-47）。《滄溟行》、《荒村》作者欲藉由小說人物的演講內容，以啟蒙一般大眾，思考在殖民地與處在弱勢階級下的侷限，並理性尋求自由之道。

四、主題人物的真實與想像

歷史素材小說的創作，首重史料蒐集與判讀，若善於對歷史觀察、思考、歸納、演繹，始能掌握故事發展及內容深度（楊周翰，1988：42）。小說中的虛構手法是將人間真實串起，如此才能呈現詮釋的意義；而創作的意義就是重組，是經由自己所接觸到的人或書所累積形成的（三木直夫等，2006：196-197）。《滄溟行》、《荒村》中的主題人物有些是以歷史上真實存在的人物作為故事角色，有些則是作者用心虛構的人物。作者是如何運用史料來形塑真實或虛構的人物？茲以表五列舉小說中的人物背景，分析他們曾參與那些啟蒙運動以及小說呈現的方式。

表五 《滄溟行》、《荒村》小說中人物參與啟蒙經歷

人物姓名	人物背景資料	參與啟蒙運動	小說的呈現方式
黃石順	桃園客家人，畢業於台北工業講習所，曾參與文化協會。原任農民組合中央委員兼爭議部長，1928年（昭和3年）9月改兼調查部長，並奉派駐在新竹州。	陳中和會社收回耕地事件、新興糖業耕地收回事件、中壢事件。籌組鳳山農民組合及台灣農民組合。	於《滄溟行》任代書的職位，作者形塑他常代表群眾與殖民者理性溝通。又記錄他認為根據日本帝國憲法，人民有言論的自由，以此請求行政主任佐倉准許街頭演說。 於《荒村》中為農民組合的領導幹部，曾率眾向郡役所抗議。計畫在桃園召開反對大會，在第一次中壢事件被捕。
簡吉	高雄鳳山人，師範學校畢業後於公學校任教，因感受底層農民生活困苦，故投身農民運動。	新興糖業耕地收回事件、第二次中壢事件、抗議土地放領政策請願活動。籌組鳳山、大甲、曾文、台灣農民組合。	於《荒村》中曾至日本參觀農民運動，為「二林事件」、「退職官吏掠奪土地事」，亦曾赴日向帝國議會請願。又以農組中央委員長身分率領佃農向日拓會社抗議。

李應章	彰化二林人，醫科畢業後回鄉從醫，後參與文化協會。因製糖會社壓榨蔗農，故投身農民抗爭運動。	二林蔗農事件、籌組二林蔗農組合，舉辦演講活動。	《荒村》中身為文化協會的理事，領導二林蔗農組合向會社爭取權益。
-----	--	-------------------------	---------------------------------

（資料來源：除引用李喬（2001）《荒村》、鍾肇政（2005）《滄溟行》為文本之外，另參考以下文獻：簡吉著，簡敬、洪金盛等譯，2005，《簡吉獄中日記》，頁 30-36；洪長源、魏金絨，2001，《二林蔗農事件：殖民地的怒吼》，頁 138-143；陳翠蓮，2007，〈菁英與群眾：文協、農組與台灣農民運動之關係（1923-1929）〉，收錄於陳慈玉主編，《地方菁英與台灣農民運動》，頁 87-119；葉榮鐘，2000，《日據下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史(下)》，頁 593-600。)

表五所列《滄溟行》、《荒村》所出現的人物，於歷史上曾真實存在過，作者以他們為書寫對象，重述知識份子如何參與日治時期的啟蒙運動。重述不僅具有填寫歷史文本之縫隙與沉默的功能，更是拒斥與挑戰帝國主義對被殖民者的單一霸權論述。日治時期有關製糖會社的爭議與糾紛層出不窮，例如：不服於肥料配售和甘蔗收購等價格過低，或揭發會社各種剝削手段。黃石順曾邀集鳳山地區五十餘名耕作者，成立「小作人組合」，並在與陳中和物產會社的抗爭中得到初步的勝利。後來，黃石順與簡吉協議創立鳳山農民組合，於 1925 年 11 月正式成立，成員共計八十餘人（宮川次郎，1999 [1927]: 91-95；葉榮鐘，2000：593-594）。然而，從日治時期法院檔案所保存黃石順、李應章等人判刑的資料，參與這些衝突事件的知識份子，在殖民統治者眼中皆是違反治安法的滋事份子。如：1927 年 11 月 7 日黃石順率中壠等地的農民，手執棍棒擁向執行扣押農作物的現場。農民組合中壠支部黃石順等 8 名主要幹部被捕，但警方不僅驅散抗議的群眾，又強行執行扣押農作物並起訴相關者。1928 年 10 月 11 日於台北地方法院進行公判，黃石順等 34 人以差押標示損壞、騷擾、公務執行妨害、差押標示損壞教唆的罪名被判刑。⁶此外，1934 年（昭和 9 年）10 月 29 日台北地方法院刑事合議部，黃石順以「治安維持法違反」為由判處入獄。⁷

又如李應章於彰化成立二林蔗農組合後，時常舉辦農民講座以啟發農民爭取權益。1925 年（大正 14 年）他帶領當地農民與製糖會社，與「林本源製糖會社」協議未成，10 月 22 日發生二林蔗農事件，共有四百多人被逮捕。1926 年（大正 15 年）9 月 30 日，台中地方法院檢察官中山孝一，以業務妨害、騷擾、公務執行妨害、傷害等罪名起訴李應章，並判處他有罪。⁸在《荒村》中的李應章形象為業務繁忙的醫師，因同情蔗農的

⁶ 台北地院：刑事判決原本，昭和 3 年第 10 冊 10 月，頁 550；昭和 3 年第 5670 號。（檔案引自「日治法院檔案資料庫」）

⁷ 台北地院：刑事判決原本，昭和 9 年第 10 冊 10 月，頁 242。（檔案引自「日治法院檔案資料庫」）

⁸ 司訓所：判決原本，昭和 2 年第 11 冊，頁 23；大正 14 年第 3612、3829、3830、3831、4000 號。（檔案引自「日治法院檔案資料庫」）

不平遭遇，基於人道而毅然出來領導。起初他在農民運動方面是個「完全的生手」，但與會社談判時，卻態度鎮靜並從容應對（李喬，2001：229-238）。至於簡吉則因二林事件而進一步思考台灣農民際遇與農村經濟的議題，《簡吉獄中日記》呈現他不僅期望藉由農村巡迴演講喚醒農民的自覺意識，並主導「台灣農民組合」的創立（簡吉著，簡敬、洪金盛等譯，2005：36、93-94）。從這些台北地院、司訓所的刑事判決，或是《簡吉獄中日記》等史料，呈現對於事件觀察的不同視角。雖然鍾肇政與李喬於寫作當時，未得見這些一手檔案、文獻；但他們除參考較易取得的資料外，勾勒歷史上知識份子的具體行動；同時，更虛構知識份子與農民一起奮戰的實際情況，並以此為故事背景，塑造各具特色的人物性格。

帝國主義論述不著重強調奴役百姓、經濟剝削及種族差異等議題，這些卻是後殖民書寫的主要內容。《滄溟行》詳細鋪陳虛擬的人物陸維樑投入啟蒙運動的敘事，作者先描繪他幼時撒野哭叫時，母親一定用日本仔來嚇唬他，因而使他養成了一聽到「日本」、「日本仔」，就中了魔咒似的動也不敢動一下。這種對於日本警官的制約反應，也是許多台灣人的集體經驗。作者不但引用俗話「日本仔打人，是毋須看日子的」（鍾肇政，2005：34-35），又描繪維樑長大感受到日本人認定台灣人是「劣等的民族，懶惰、骯髒、迷信、貪婪、膽小、懦弱、卑屈、狡猾、陰險，這些惡習與低劣品性，都集中在台灣人身上。」他經常從到店裡的顧客的神色上，感到這種輕蔑的眼光（鍾肇政，2005：49）。這些日人的優越感，以及書店老闆的種族歧視，摧毀了維樑原想藉由努力通過專檢、考上醫專，與日人文子小姐結為連理的願望。他在日本人開的書店裡博覽群書，因而開啟視野，但最後才終於明白無論自身如何努力，也無法突破種族隔閡並得到認同。回鄉後目睹農民的種種遭遇，更加深身為殖民統治知識份子的責任感。小說又描繪阿四叔與其子辛苦耕種幾畝官有地，二十多年來猶貧窮異常，又因欠「會社」的租穀而可能遭撤佃的絕境。維樑的兄長維棟本以為這些皆是命運，但維樑卻認為阿四叔這類人貧窮的情況，其原因「一大半是官方造成的」（鍾肇政，2005：64）。在維樑心中，日本人以統治者自居，榨取、任意宰割，並剝奪台灣人原本應當享有的平等、自由，連話都不能講，有苦更不能任意訴說的困境（鍾肇政，2005：32）。維樑認為，「於天災以及某些人禍，生存之道往往是忍受。但若一味地忍受人為的壓迫、詐欺與剝削，那便是愚昧。」他要讓農人明瞭這其間的區別，並鼓勵爭取基本權利（鍾肇政，2005：117）。作者藉由不容於殖民者的邊緣人物，以啟蒙話語試圖轉變世人的價值觀。他並不認為那是煽動，要爭的是正義，「有那麼多可憐的人在受著榨取剝削，不，這已經不祇是榨取剝削，是宰割了。」（鍾肇政，2005：24）這些小說中的敘事，再加上人物與人物之間的對話或人物內在意識的流露，呼應了逆寫帝國的書寫策略在於以邊緣（margin）人物角色，質疑帝國主義的侵略與奴役台灣人民的正當性。

《滄溟行》中的陸維樑出身於龍潭九座寮望族陸家，家族早年曾參與抗日運動。小說描述他的自覺過程，並投入文化啟蒙運動的情景，但最後卻如「巨鯨西游」離開台灣。

小說結尾如此安排，可想見作者鍾肇政當時的複雜處境，影響其寫作的思維。他曾自言，當決定將著作命名為《台灣人》，一直到整個構思的階段，時常「靈魂的戰慄」（鍾肇政，1998：203）。論者以為 1945 年後具有日治時期經驗的本土作家，有著「敘史情結」的傳統，他們敘述的是在中華民國史以外的台灣史，「隱然」形成一種敘事傳統，鬱結成為不得不書寫的情結（complex）。《滄溟行》所述不見容於日本殖民主義史的歷史建構，除了具備後殖民理論所說的重建「後殖民主體」（post-colonial subjectivity）我族正面歷史記憶之外，很弔詭的因為鍾肇政強調「台灣」的字眼，而使廁身於中華民國轄下的《台灣人》受到查禁、監視的命運。抗日的台灣卻不見容於抗日的中華民國史，說明了戰後在歷史解釋權的爭奪戰中，台灣作家邊緣化的處境竟與戰前若合符節（陳建忠，2003：159）。《滄溟行》顯現作者在高度自我期許的想像工程中，時常感受高壓的政治氛圍與莫名的壓力，不由自主受到白色恐怖羅網的侷限。展現在小說敘事中，即透露出這些人物的行動是扭曲時代裡，出現的一個扭曲的案例。

李喬於《荒村》中所應用敘述歷史事件的手法，也是選擇以小人物的視野見證重要的歷史時刻，他虛構人士劉阿漢、劉明鼎父子的個人記憶，這些書寫卻如此真切地揭露了台灣人的集體記憶。小說中的劉阿漢為苗栗大湖人，曾加入隘勇隊，後為文化協會會員，為台灣農民組合大湖支部的負責人。作者形塑劉阿漢的個性剛烈，終其一生參與抗爭活動，最後因不肯提供兒子劉明鼎的形蹤，而遭刑求身亡。這些包括施打毒液致死與諸多令人難以想像的酷刑，多是李喬經由田野訪談所得的靈感。⁹《荒村》中羅列「劉阿漢專案」記錄一生的經歷檔案，包括：三進三出防蕃隘勇一職、拒絕擔任巡查捕、「詹惡事件」、舊式蕉廊製糖、羅福星事件、參與文協活動等。小說刻劃劉阿漢當時的反應：「起初他只是姑妄一觀的，到此，他是冷汗淋漓而下了；不是害怕，而是統治者可怕驚人的精密記載。片山一郎課長適時取走他手上的卷宗，他還是渾然不覺。」（李喬，2001：436-437）李喬在小說中描繪殖民者藉由對特定人士鉅細靡遺的建檔，作為監視與控制形式的縮影。這些總督府所蒐集整理的檔案，亦可能成為日本殖民國想像、分析、研究與監視的客體或對象。劉阿漢曾抗議論道：「法律，也要合天理人情。法律不是保護強盜惡霸的。」但金川課長卻回應：「反抗，就是土匪，要殺頭的」（李喬，2001：150-151）。逆寫帝國的寫作策略具有使民眾自己發聲，挑戰帝國主義霸權的單一論述，形成眾聲喧嘩的辯證。

劉阿漢之子劉明鼎，畢業於高等科，參與多場文化啟蒙演講活動及二水事件農民抗爭運動。《荒村》中塑造他具人道關懷的熱情，且性格頗為激進。劉明鼎曾慨嘆：「殖

⁹ 李喬自言：「有一個苗栗人名叫郭常，他是苗栗市的中央委員的候補委員，在苗栗有三間店面和三甲的田。為了要支持農民組合，毀屋以赴，最後被關進監獄，叛了八年的徒刑，但是被關約一年左右就被放出來，放出來以前就被打上毒藥針，回來後一個禮拜就死了。這是真實的事，小說裡頭的名字是郭秋揚，他的遭遇我把他寫在劉阿漢的身上。」（李喬，〈寒夜三部曲自剖〉演講錄音，收錄於台灣客家文學館資料庫：http://literature.ihakka.net/hakka/author/li_qiao/default_movie.htm）

民地百姓的悲哀，台灣人的悲哀，什麼時候才能擺脫，才能出頭天？」（李喬，2001：196）全書多刻劃他對於是否終身投入抗日運動，曾在內心有所掙扎。從苗栗城隍廟那一「戰」，劉明鼎看到橫在眼前的一道絕谷，台灣人命運面前的一道死冷的厚壁巨牆。但他不認命也不屈服，又想到劉阿漢所說：「人生，盡心而已。」這是父親歷盡人間千萬苦難中提煉出來的精華。劉明鼎心想：「人生，好像處在兩端都是強大引力間的小魚，他必須分秒不停地掙扎抗拒才能生存下去，這期間沒有猶豫，沒有議論的餘地。於是抗拒，就是活存下去的唯一憑藉，於是抗拒，成了生命本身的責任，甚至是生命的形式也不為過吧。」（李喬，2001：330）作者於書末〈荒村之外〉交代他於昭和9年在拘留室中身亡。作者在重述故事的過程中，以劉明鼎等小說中的角色象徵殖民統治下的邊陲的人物；雖然一群左派知識份子的肉體已逝，但當年他們對弱勢的關懷與行動，卻於小說中綿延其生命力。

在女性的塑像方面，小說也以女性的言說呈現抵抗中心論述，如《滄溟行》中維樑的母親認為，姪子正因為是做了保正、庄長，更應該要受到教訓。故以犀利的言詞斥責，且話中帶刺對維揚說：「可不是人人都像你這麼能幹有為」，此處以反諷的敘事方式，呈現文字張力（格非，2002：34-35）。甚至說道：「我倒覺得你頭掉下來最好」（鍾肇政，2005：298），則是以「頭掉下來」的革職象徵，嘲諷那些協力殖民者。學者曾分析李喬女性塑像提到：燈妹為大地母親具有自足自生的能量，它是生命之源，符合「大地母親」、「原始母神」的最初形象（楊翠，2007：609）。燈妹除了具大母神的原型意象之外，李喬也藉由劉阿漢之口說出：「燈妹，是患難老妻，也是護自己、慰自己的母親啊。那麼，還有什麼不能容納的呢？」（李喬，2001：309）在劉阿漢判刑後，她成了「這個家的地基，又是屋頂，還又是棟樑。」此部小說結尾劉阿漢臨終前與燈妹的談話，顯現對她承受的苦難所感到遺憾及歉疚。李喬在進行創作之前，已有一套歷史文化觀，並且具體呈現於《寒夜三部曲》中，以土地作為主要的辯證元素，連結了母性與生命，幸福與痛苦，藉此說明人與土地之間無可疏離的關係（申豐惠，2006：131-132）。女性形象的韌性與張力，不僅包容親人，為啟蒙者的精神後盾；同時化為生生不息的土地，在惡劣的環境下仍孕育萬物。

鍾肇政與李喬運用陸維樑、劉阿漢、劉明鼎參與啟蒙運動等平行人物，或鍾益紅、李勝丁「三腳仔」協力者等對比角色，呈現小說中人物的多種面貌。又如李喬透過劉阿漢於台灣農民組合召開第一回全島大會時，對這些對比人物大加批評：「任他怎麼神氣，三腳仔就是三腳仔，怎麼裝，也不會成四腳仔。」「所以三腳仔最可恨，也最可憐。」（李喬，2001：405）這應是飽受壓迫的台灣人普遍的心聲，小說呈現人性的多面、複雜，為讀者留下人性思考的空間（歐宗智，2007：40-45）。李喬運用三腳仔加以反襯，另以反面人物對比主角，並不遜於正面人物形塑的效果，因為三腳仔卑劣可鄙的行為所帶來的嘲諷，足以引出主角的深沉性格及高貴人性（盧翁美珍，2006：275）。劉阿漢曾感嘆道：「那些告密、監視、捕捉、拷打台灣人的，都是台灣人自己！」「憐惜生而

為人，為一個台灣人的無奈！然而，對漢奸還要憐惜，受害於漢奸的同胞呢？」（李喬，2001：344）日治時期的監控體系包括警察制度、保正或三腳仔，從《荒村》中處處可見告密者的身影。

不論是屠殺、滅族、鎮壓、逃亡，歷史災難之所以值得書寫、應該書寫，除了讓湮滅的歷史重現、閤啞的聲音重新發聲，絕不僅止於召喚歷史的悲情而已。從災難歷史牽涉的落點政治角度來看，還包含從特定社群或族群的觀點，對歷史進行反寫（write back）、重寫（rewrite）、救贖、療傷、危機中的轉機、史觀的重建，及敘述形式的創新等問題。歷史敘述奠基於寫實模仿原則，執著於歷史命定論，致使虛構的小歷史無法發揮作用，從歷史重寫、補寫、反寫的角度來看，所有的「歷史本然」、「文化本真」原就包含了書寫者個人書寫位置的特定議題及文化意識型態（陳淑卿，2002：55-85）。美國的童妮·摩里森（Toni Morrison）根據所收集到有關於 1851 年名為瑪格麗特·迦諾（Margaret Garner）「黑奴」的真實史料，而撰寫成小說《美國人三部曲》中的第一部《寵兒》（*Beloved*）。這本著名的小說於 1987 年出版，書中母親為了不使女兒與自己一樣淪為奴隸，而親手弑死親身骨肉。作者以文學的想像手法，將這個女兒化為鬼魂，打破生者和死者區隔的方式鋪陳情節，模糊寫實與魔幻的界線，使讀者看到從記憶的裂縫中所洩漏的部份（何文敬，2003：1-12）。作者藉由此類書寫對奴隸制度真實內幕的無知與遺忘，以及「民族失憶症」（National amnesia）進行批判。逃避歷史是民族脆弱的表現，Toni Morrison 認為揭露歷史的真實與傷痛，並與民族共同分擔歷史記憶中的事件與意象，可以治療個人乃至民族的集體創傷（Morrison, 1994: 251）。文化在虛構敘述的過程中得到衍異的可能，文學則創造歷史的多重時間性。《寵兒》採反覆迴旋式的敘述策略，以細膩的文學表現手法批判奴隸制度，並暗喻自由的可貴。《滄溟行》、《荒村》未如《寵兒》以繁複的結構說故事，而採以順時直敘的方式為主，夾雜一些倒敘的回憶片段及意識流手法，樸素呈現人物的具體抵抗活動。如此直敘沉重的筆調，反映日本殖民台灣時期種種不公不義的史實，在書寫人性扭曲現象的同時，也流露對人權等普世價值的內在企求。

五、結語

大河小說作者常藉由歷史素材的編織，呈現個人對事件主題的闡釋；且企圖透過重現過程，建構民族的共同記憶。回顧鍾肇政不僅曾積極參與文學運動，包括：《台灣文藝》編輯、翻譯日治作家作品、串連台灣人作家並培養後進、擔任「吳濁流獎主任委員」等；且即使是遭國民黨監控的時刻，他仍創作不懈。至於李喬曾自言寫《寒夜三部曲》以前，短篇小說已經發表了一百多篇，長篇小說也發表 4 本。他將數百萬字的史料整理成表，並把這些事件全部記憶在腦海裡；又到事件發生地田野調查，再現歷史事件的時

間、空間架構。他在田野調查中漸產生台灣意識，對台灣同樣甘苦的人產生同心同種同類的感覺，所以試圖將父母親三代，寫成貫穿台灣當代史 100 年的大河小說。他自言這部作品是在他的文學技巧已經熟練到某一個程度，體力及注意力集中時始能完成的。¹⁰「歷史可以被原諒，但不可被遺忘。」爬梳這些大河小說的文本所蘊含敘事意義，有助於理解鍾肇政與李喬創作的使命感，與發願書寫長篇歷史素材小說的背後動力。

李喬以自身的寫作經驗分享，提出大河小說多具有人物與結構複雜、主題多層次、敘事時間長，以及作者「人格」完全投入等特性。¹¹歷史素材小說中的有些論題是自身內涵的（self-contained），祇須在作品中求解；但如今看來這些論題多有新的理解（re-understood）。作品與世界之間，常存在著某種辯證性的關係（Montrose, Louis A. 著、陳界華譯，1992：66）。日治時期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的記載是以負面呈現抵殖民的活動，但《滄溟行》、《荒村》描繪民眾的處境，並為弱勢者發聲。這些啟蒙運動史料的轉化，即成為台灣大河小說重建抵抗書寫的典律。小說作者除了邀請讀者加入主動詮釋歷史文本之外，並與文本進行對話與辯證；其策略是從歷史文本忽略的空缺開始，這些抵殖民的文本需小說家與讀者的填補、指涉。如《滄溟行》中的陸維樑、《荒村》中的劉阿漢、劉明鼎等人，皆是在自我思辯反覆對話後，才尋找到自我在歷史上的定位。本文參酌相關一手檔案、文獻、資料庫，分析小說中的情節編織技巧，詮釋其歷史敘事的特殊質性，並探析作家如何藉由小說人物的言論及行動，想像日治時期台灣群眾的啟蒙思維。同時就台灣文化協會與農民運動史料的轉化、演講的氛圍與啟蒙意義，及主題人物的真實與想像等層面爬梳文本，呈現大河小說與歷史如何再現的對話。

¹⁰ 李喬，〈寒夜三部曲自剖〉演講錄音，收錄於台灣客家文學館資料庫，網址：http://literature.ihakka.net/hakka/author/li_qiao/default_movie.htm。

¹¹ 李喬曾於 2008 年 5 月 8 日受筆者之邀，至台師大台文所演講有關〈大長篇小說的寫作——以《寒夜三部曲》為例〉。

引用書目

一、中文書目

- 王詩琅，1988，《台灣社會運動史——文化運動》，台北：稻鄉。
- 申惠豐，2006，〈說故事——論《浪淘沙》的敘事型態及其意義〉，收錄於財團法人文學台灣基金會主編，《台灣大河小說家作品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南：國家台灣文學館籌備處，頁 125-141。
- 何文敬，2003，〈魂兮歸來：童妮·摩里森的《寵兒》〉，收錄於 Morrison, Toni 著、何文敬譯，《寵兒》，台北：台灣商務，頁 i-xii。
- 李有成，2003，〈續論〉，收錄於李有成主編，《帝國主義與文學生產》，台北：中研院歐美研究所，頁 1-20。
- 李喬，〈寒夜三部曲自剖〉演講錄音，收錄於「台灣客家文學館資料庫」：http://literature.ihakka.net/hakka/author/li_qiao/default_movie.htm，瀏覽日期：2009 年 5 月 6 日。
- 李喬，2001，《荒村》，台北：遠景。
- 李喬，2006，〈歷史素材書寫——我的心得〉，收錄於財團法人文學台灣基金會主編，《台灣大河小說家作品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南：國家台灣文學館籌備處，頁 181-220。
- 林柏維，1985，〈台灣的民族抗日運動團體——台灣文化協會之研究（1921-1927）〉，中國文化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 林美華，2004，〈鍾肇政大河小說中的殖民地經驗〉，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 邱琬雯，2001，〈民眾史的思想與建構：以日本地域史的編纂為例〉，《歷史月刊》，第 156 期，頁 98-104。
- 洪長源、魏金絨，2001，《二林蔗農事件：殖民地的怒吼》，彰化：彰化縣文化局。
- 格非，2002，《小說敘事研究》，北京：清華大學。
- 陳建忠，2003，〈後戒嚴時期的後殖民書寫：論鍾肇政《怒濤》中的「二二八」歷史建構〉，收錄於陳萬益主編，《大河之歌——鍾肇政文學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桃園：桃園縣文化局，頁 153-187。
- 陳淑卿，2002，〈書寫原住民歷史災難——「倒風內海」的空間歷史與《一九四七高砂百合》的歷史空間〉，《中外文學》，第 309 期，頁 55-85。
- 陳翠蓮，1986，〈日據時期台灣文化協會之研究——抗日陣營的結成與瓦解〉，國立台灣大學政治研究所碩士論文。
- 陳翠蓮，2007，〈菁英與群眾：文協、農組與台灣農民運動之關係（1923-1929）〉，收錄於陳慈玉主編，《地方菁英與台灣農民運動》，台北：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頁 87-119。
- 楊光華，1998，〈日據時期台灣農民組合之研究〉，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楊周翰，1988，〈歷史敘述中的虛構——作為文學的歷史敘述〉，《當代》，第 29 期，頁 30-47。

- 楊翠，2007，〈「大地母親」的多重性——論李喬《寒夜三部曲》、《（情天無恨》、《藍彩霞的春天》中的女性塑像〉，收錄於姚榮松、鄭瑞明主編，《李喬的文學與文化論述：台灣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台灣文化及語言文學研究所、台南：長榮大學台灣研究所，頁 605-642。
- 葉榮鐘，2000，《日據下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史（下）》，台中：晨星。
- 廖玉蕙，2000，〈虛構與真實——談散文創作與閱讀的弔詭〉，《世新大學人文社會學報》，第 2 期，頁 95-116。
- 歐宗智，2007，《台灣大河小說家作品論》，台北：前衛。
- 潘俊英，2004，〈台灣農民運動初探（1895-2005）〉，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盧翁美珍，2006，《神秘鱒魚的返鄉夢——李喬「寒夜三部曲」人物透析》，台北：萬卷樓。
- 錢鴻鈞，2002，〈從大河小說《濁流三部曲》看台灣文學經典《亞細亞的孤兒》〉，《戰後臺灣文學之窗——鍾肇政六百萬字書簡研究》，台北：前衛。
- 錢鴻鈞，2003，〈《滄溟行》與法理抗爭——論鍾肇政的創作意識〉，收錄於陳萬益主編，《大河之歌：鍾肇政文學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桃園：桃園縣文化局，頁 74-117。
- 鍾肇政，1998，《文壇回憶錄（一）》，台北：前衛。
- 鍾肇政，2005，《滄溟行》，台北：遠景。
- 簡吉著，簡敬、洪金盛等譯，2005，《簡吉獄中日記》，台北：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
- 譚君強，2008，《敘事學導論——以經典敘事學到後經典敘事學》，北京：高等教育。
- Montrose, Louis A. 著、陳界華譯，1992，〈文本與歷史〉，《中外文學》，第 12 卷第 12 期，頁 65-109。

二、日文書目

- 三木直夫、李喬、周婉窈，2006，〈座談會『寒夜』の背景〉，《植民地文化研究》，第 5 號，頁 196-198。
- 「日治法院檔案資料庫」：<http://tccra.lib.ntu.edu.tw/>。
- 条約局法規課編，1964，《日本統治下五十年の台湾：「外地法制誌」》，東京：条約局法規課。
-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1995 [1939]，《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三）》，台北：南天書局。（據 1939 年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版本影印）。
- 宮川次郎，1999 [1927]，《台灣の農民運動》，收錄於《日治時期台灣文獻史料編輯》，第 8 號，台北：成文。（據 1927 年拓殖通信支社刊本影印）
- 淺田喬二，1978，《日本帝國主義下の民族革命運動》，東京：未來社。

三、英文書目

- Anderson, Benedict. (1991).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New York: Verso.
- Ashcroft, B. (1989). *The Empire Writes Back: Theory and Practice in Postcolonial Literature*. London: Routledge.
- Hinchman, Lewis P. & Hinchman, Sandra K. (1997). *Memory, Identity, Community: The Idea of Narrative in Human Sciences*.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Kant, Immanuel. (1963). What Is Enlightenment? In *On History* (pp.3-47) (Lewis White Beck, Trans./Ed.). London: Macmillan.
- Morrison, Toni. (1994). *Conversations with Toni Morrison* (Danille Kathleen Taylor-Guthrie, Ed.). Jackson M.S: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Representation of the Enlightenment Movement in Taiwan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the Historical Narrations of the Novels *Cang Ming Xing* and *Huang Cun*

Lin, Shu-hui

**Associate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Taiwan Culture,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Roman-fleuves written by Taiwanese novelists usually adopt the narrative style of fictional and real historical events. The prevailing themes of these novels concern fate of people and idealistic thinking. The two novels in discussion in this essay are *Cang Ming Xing* from *Taiwanese Trilogy* by Zhong Zhao-zheng and *Huang Cun* from *Cold Night Trilogy* by Li Qiao, both of which are based on historical materials on Taiwanese Cultural Association and Taiwanese Peasants Union to represent the scenarios of the familial involvement in the Enlightenment Movement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in Taiwan.

The 18th-century German Philosopher Kant characterizes Enlightenment as “man’s emergence from his self-incurred immaturity,” and the goal of Enlightenment is to modif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sonal will, authority and use of rationality as well as introducing a world view with an emphasis on respecting human rights. We are going to discuss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First, how novelists consciously digest these voluminous and complicated historical materials to reconstruct many important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events of the Enlightenment Movement in Taiwan; secondly, how they employ the fictional and real historical materials to narrate and reconstruct the historical contexts in their novels. The discussion of the historical contexts in the novels will be based on the following aspects; adap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on Taiwanese Cultural Association and Taiwanese Peasants Union, public speeches and their meaning of Enlightenment, and the fictional and factual portrayals of the protagonists in the novels. We also refer to many first-hand documents and archives to analyze the techniques used by novelists in the plots, and interpret the uniqueness of their historical narration. Furthermore, by analyzing the characterizations of protagonists in the novels, of their actions and speeches, we can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Enlightenment thinking of Taiwanese people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Keywords: roman-fleuve, Taiwanese Cultural Association, Taiwanese Peasants Union, narration, representation